

读读容闳

傅璇琮

我想介绍一本值得我们思考的小书，书名叫《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》，是晚清一位名叫容闳的美籍华人写的。此书原用英文写，1909年在美国出版，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了文言体的中译本，取名为《西学东渐记》。现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王慕同志重新翻译的本子，书名按原意改了过来，并用现代汉语译，似更接近于原著的风格。

这本书在近现代中国是颇有影响的。我在年轻时曾读过商务的译本。不知怎的，我总觉得原来的书名似更能表达容闳作书的用意，“西学东渐”这一简单的词组，真能勾勒出那一整个的时代，以及那一时代不少忧国伤时之士的深切情怀和血泪向往。容闳于1828年出生于澳门以西一个小岛（现属广东香山县）上的穷苦人家。1839年进入英国传教士郭施拉夫人创办的学校，后又升入一所英国商人在澳门建立的马礼逊学校。由于他勤奋向学，刻苦上进，受到学校的重视，遂于1847年他19岁时保送到美国学习，并且进入美国第一流学校耶鲁大学。他于1854年毕业时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。这时他已是美国公民。就在这时，他思想中极可珍贵的火花闪现了，他说：“教育已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。”他真诚地自问：“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就在这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，他作了今天使人尚为之感奋的决定：“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。”于是毅然放弃美国现成的就业道路，决心返回他“无时无刻不渴望她

走向富强”的故国。

容闳凭他的英语能力，凭他的学识，回国以后，在当时的中国环境，在洋行中做事，经商致富，是一帆风顺的路。事实上也有好几个人保荐他做买办。但他终于谢绝，说：“买办固然是一个赚钱的好差事，但终归奴仆性质。”他在回国后曾对他母亲说：“大学教育的价值远超过金钱。”后来在不同职务中，他总是把这一信念牢记心中：“至少有一个中国人是把洁白的名誉和诚实的品格看得比金钱更重要。”

容闳与我们，固然时代不同了，社会不同了，但他的这种人生观念与价值信念不是仍可以引起我们思索吗？

容闳在中国的追求实际上是一个悲剧。他确实深爱这穷苦的故土，但他回国后所接触的现实却在在使他失望。最使他伤心的，是“整个官僚组织千疮百孔，由上到下都行贿成风，美其名为馈赠，实际上就是贪污纳贿”。他认为清朝政府必然走向没落的主因，即在于“腐败”，“一切都是交易，出价最高者就可以得标”，“整个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欺诈舞弊的组织”。

就在这样一个社会，他还是真诚地以为，“通过西方教育，中国将得以复兴，变成一个开明、富强的国家”。正因如此，他不屈不挠地努力，说服曾国藩和其他一些实权人物，争取向美国派遣留学生。后来清朝廷根据他的建议，决定分批向美国派遣12至14岁120名学生。这使容闳感奋不已，竟高呼“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”。

但结果怎样呢？容闳所极力主张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，终因官场的倾轧，封建当权派的无知与偏执，未到年限即被中途召回。这批学生遂即也星流云散。容闳毕生所向往的事业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，不得已于晚年再度去美国，写下这本《追忆》来寄寓他难以为言的感慨。

我觉得，这本《追忆》所写的时代都已过去了，具体的情事

也只不过是历史的陈迹，但容闳这个人，他的思想行为，他的美丽幻想和一生追求的教训，却可给人以有意义的思索。历史是可以使人们在沉思中提高自己的。

(作者系中华书局编审、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)

